

廣州文史資料

第二輯

(內部發行)

政协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廣州文史資料

第二輯

政协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1961年9月

編輯凡例

一、本選輯的印行，旨在積累歷史資料和推進史料征集撰寫工作的開展。所選的稿，多是撰寫者（提供者）的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各有一定的史料價值。但這種史料是各人從不同的角度提供的，內容可能不盡翔實，觀點可能不盡正確。因此，本選輯只在內部作為不定期刊物發行，以供歷史研究工作者的參考。

二、本選輯所搜集的史料包括清末到全國解放各個時期的各方面，舉凡軍事、政治、經濟、文化、藝術、華僑等的史料，一律歡迎。撰寫不拘體裁，不求完整，只要具體真實而有史料價值者，均可選入。

三、本選輯的資料，歡迎閱者提出補充和訂正。

四、本選輯對來稿可加以綜合、刪節和文字上的修改。

目 录

我与广东空軍.....丁紀徐 (1)
(白衛紀录整理)

从蔣、余矛盾說到广州弃守.....李洁之 (21)
(白衛、逊鷹整理)

蔣介石捉放莫希德李洁之 (46)

西南反蔣的回忆罗翼群 (50)
(白衛紀录整理)

陈济棠勾結美帝与垄断广东糖业馮 平 (72)

陈济棠搞“軍垦”与元老派的暗斗
.....柳乃斌、柳藹人 (83)
(遺稿, 清若整理)

“广东中央銀行香港分行”筹設記要叶少华 (87)

陈济棠、林翼中操縱党务、参議會
和民众团体述要柳挺生 (93)
(遺稿, 金重、清若整理)

李汉魂封金挂印与余汉謀回粵倒陈胡銘藻 (113)

关于余汉謀投蔣倒陈的补充資料卜汉池 (123)

“张黄事变”前后的粤局……………凌仲冕（127）

“张黄事变”前张发奎在香港

拉攏軍閥余孽的勾当……………林志鈞（135）

汪精卫投日前后側紀……………陈曙风（139）

关于抗日时期蔣、余、李在广东

卖鴉片的記述

蔣介石独吞烟土不遂改为“外銷”……………郑应时（146）

余汉謀、李汉魂爭夺承銷利益……………卜汉池（148）

防軍、恶霸、承銷分肥……………凌仲冕（152）

短 稿两則

陈济棠玩弄的“效忠宣誓”……………刘紹武等（45）

陈济棠在广东办实业的意图……………林扬永（92）

我与广东空军

丁紀徐

广东空军是大革命时代的产物，原来有其光荣的革命传统。在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期间，广东的革命政府得到苏联的援助，继建立黄埔军校之后，于一九二五年在广州大沙头成立了广东航空学校，初办的一二两期都是由黄埔军校选送学生入校训练。那时苏联接受我革命政府要求，除了供给飞机弹械之外，还派来航空教官协助我们加紧培养空军人才。一九二六年秋，革命政府出师北伐，北伐军总部开始成立了航空处，广东空军在北伐战争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在大革命摇篮中逐步成长壮大起来。可是，自从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后，广东空军在蒋的操纵下，便从革命武装转变为反革命武装，长期以来，一面参加了反人民反革命的“剿共”战争，一面又卷入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互相厮杀，成为军阀官僚的内争工具。十年间（从一九二六到一九三七）我个人在广东空军历次重大事变中都被捲进漩涡，而且成为主要角色之一。当时长期为反动派所利用，脱离人民，迷失方向，至今思之，犹感愧痛。以下，根据个人过去的一些经历和见闻，着重谈谈广东空军从拥蒋到反蒋，又由反蒋到投蒋的波折过程。

内战倾轧，投奔南京

先从个人投身广东空军的经过谈起。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我刚由欧洲德、法两国学习航空技术毕业，返抵香港。由于过去我国航空人才极少，加上当时正值国民革命軍誓师北伐，回到广州不久，就被任为广东航空学校少校飞行教官。一九二七年二月，广东革命政府北伐軍的航空处（当时处长为林伟成）选送了一批飞行人員到苏联深造，我也在被选送之列。刚巧陈济棠（时任第十一师师长）和林翼中（十一师政治部主任）也到苏联考察，大家在旅苏期間，常有来往，彼此之間結下了一段交情。我在苏联学习了十个月。十二月上旬由苏联回到广州。那时蔣介石已叛变革命，在广东空軍內部，林伟成和张惠长两派斗争激烈，我对林有意见，因而沒有回航空处报到而跑到香港和张惠长派的人物有所勾搭。抵港第二天就发生了广州公社起义。一九二八年春，广州又被反革命势力重新控制，我便回去航校当飞行主任。那时林伟成已因风潮辞职，张惠长继任第八路軍航空处处长，周宝衡为广东航空学校校长，以后张惠长到各省作长途飞行，航空处处长职务交由陈庆云代理。陈委我当航空队的副队长（队长胡錦雅，那时航空处所属空軍只編有一队，黃光銳亦为該队队员之一）。张惠长和陈庆云都是中山人，在政治上属于孙科的“太子派”。我初时会拥护张惠长反对林伟成，有一次，张要非法在航校报銷汽油四万元，由于我是飞行主任兼机务主任，按规定要經過我的签章才能报銷，张要我照办，我不肯負責，因此大家鬧得很不愉快。那时原定由我率領五机到各省作长途飞行，报上也宣传我們即将出发，张惠长此时却撤換航校校长周宝衡，而自兼校长，我和周宝衡平时感情較好，因此就和一批同情周的教官、学生、和飞行員掀起了一个反对张惠长的罢飞罢課风潮。我原来已奉令出发作长途飞行，至此也临时退出。那

是一九二九年冬的事。是时张惠长已发表为南京中央的航空署长（属軍政部），但仍兼长八路軍航空处和广东航校。他认定我是这次风潮的主角，因此便向南京中央告状。有一天林翼中（自一九二九年春李济被蒋介石扣留，陈济棠接任八路軍总指揮后，林虽轉搞党务，但与陈关系极密，有“文胆”之称）忽深夜來訪，据說南京中央已对我下了通緝令，林劝我速离广州暫避。第二天我便跑到香港去，那时航校和空軍中参加反张风潮的教官、学生、飛行員大約有一百多人，大部分也先后跟我跑到港、澳。南京对我的通緝令不久就在报上发表，理由是鼓动风潮，反对上級，违抗軍紀。我在港住了好几天，便秘密回广州见当时的广东省主席陈銘枢訴說不平，他沒有談出什么解决办法；我又轉到梧州找陈济棠，陈济棠却表示愿意負責把問題解决，但劝我把这一百多鬧风潮的人員拉回来，又送我四千元旅費，叫我到南洋一带走走，避过风头。我后来並沒有去南洋，只到了澳門暫住。那时正值閻錫山、馮玉祥和蒋介石打中原大战，李宗仁、张发奎等也和陈济棠打粵桂战争。为了要加强內战实力，馮玉祥和张发奎都曾派人到澳門找我，想把我們这一批人拉过去，作为他們建立空軍的骨干。蒋介石和陈济棠获知此事，便开始有点着急。为了解决这一次持續了几个月的空軍风潮，陈庆云奉宋子文命到澳門找我談判，記得談判地点是利为旅酒店。陈传达宋子文意見，劝我們到南京去，我們都坚持以张惠长下台为条件。最后陈說宋子文已准备在財政部稅警总团成立航空队，欢迎我們参加。于是我便到上海见宋子文，这是我和宋子文发生关系的开始。那时，据陈庆云方面通知，宋子文已打算派我为稅警总团航空队长，我們这一批鬧反张风潮的人員已陸續在南京集中，但后来事情

有了变化：据说宋子文的建立税警总团航空队的计划没有得到蒋的批准，因此陈庆云又来劝我们到南京航空署工作。本来我们反对张惠长，那时张是署长，又回到他下面工作是很不服气的；但风潮拖了那么久，闹下去问题很多，而且大家已到了南京，结果只好答应。那时，中原大战激烈，我们也奉命先后参加泰安、济南各次战役。后来空军移防螺河，蒋介石到前方督师，也几次坐我驾驶的飞机视察阵地，我因此和蒋也有了接触。閻、馮失敗后，我们又回防南京。这时候，我和张惠长之间的关系逐步好转，蒋介石也对我們广东空军人员很注意，我被提升为空军上校，任南京空军第六队副队长（队长是周宝衡）。

宁粤分裂，歧路徬徨

一九三一年三月初，报载蒋介石扣留胡汉民于湯山。那时宁粤关系逐渐紧张，传说古应芬、陈济棠等在广州要发动反蒋。四月下旬，南京政府召开的全国航空会议刚刚闭幕不久，张惠长忽秘密离京赴港。当张未走之前曾在闲谈中对我慨叹说：“我们广东人在南京工作也实在不容易，空军内部江浙派一天天得势，恐怕结果非被他们排挤掉不可！”张离京之后，他的秘书伍頌祺通知我说：“张署长已到香港了，目前广东空军人员都已准备走，广东已发动反蒋，我们广东人也应该有自己的主意。”他还把张惠长临走前签下的一道命令交给我，内容是要我立即率第六队飞江西吉安候命。伍頌祺又嘱我绝对保守秘密，还约好到上海后和我联络，要我在接到“买瓷器”（当时和伍约定的起事隐语）的电报后，即率领全队飞机飞回广东，有可能时还希望我策反其他机队。我当时同意接受任务，第二天便率第六队全队飞机十架

逕飛吉安集中。那時第六隊隊長周寶衡和第四第五兩隊的飛行員二十多人已隨張惠長先後離職回粵。起先我確也打算飛走，但到達吉安後，回粵信念發生動搖，因此當伍來電之後，自己躊躇了幾天還下不出起事飛粵的決心。這時候忽接宋子文來電，要我“即飛南京有事商量”。同時接宋電報的有另一隊長劉芳秀（福建人），宋還叫他和我一同回南京。我接電後心裡有點不安，懷疑已受監視，結果只好和劉一同飛返南京。

抵京的當天晚上，我到宋子文的陵園別墅見宋。當時宋正和幾個美國人在打撲克牌，見了我便引我到他的書室談話，他的隨從秘書陸文瀾初時也在座，不久陸退出，室內只有我和宋子文兩人。宋子文問我知不知道空軍方面已發生逃跑事故。我答并無所聞。宋又問我：“張惠長已走了，你事前知道嗎？”我又答說不知。宋子文又告訴我：廣東飛行員先後離職走了不少，希望由我設法穩定那些還沒有走的廣東飛行人員，使他們不再逃走。宋子文當時拿出一張十萬元大洋的支票，叫我收下作為對廣東空軍做工作的聯絡活動費用。宋又說：“張惠長走後，已電邀黃秉衡回國接任航空署長，將來可派你任副署長。”我當時覺得當副署長不錯，就決心留下來，但又感到對聯絡工作並沒有把握，接了宋的錢，聯絡不成反為不美，因此沒有接受那張十萬元支票。我對宋子文說：“不要過於重視那班人，他們要走就讓他們走好了。”接着又自告奮勇地說願負責訓練飛行員工作。宋听了很高興。我建議向德國購買“容克”式戰鬥機（可作輕轟炸機使用）兩隊，并告訴宋子文，我認識那家德國飛機公司駐南京總代理，可以立刻看到該式飛機的貨樣。宋就叫我負責辦理，以後我按計劃向那德國商人買了兩隊“容克”式飛

机，并負責主持当时航校的一个毕业班（三十人）的飞行訓練。那时候，我感到宋子文对自己很信任，頗有长期留南京的打算。

訓練工作搞了大約不到一个月。有一天，我的爱人（还有一个张惠长的家人陪同）忽由广东来队部找我。她带了一封陈济棠、张惠长、陈策、陈庆云等联名的密信，劝我回广东参加反蔣，并希望我把留南京的广东空軍人員尽量拉攏回粵。我接信后思想很矛盾，一方面觉得和宋子文关系弄得不錯，留京工作有了靠山；另一方面又觉得在广州旧朋友多，生活上也比較来得习惯，加上爱人也极力主张我回去，結果还是最后决定秘密离京。为了掩飾各方耳目，我一面暗中买好了車票船票，一面請航空署的一些同事吃飯，扬言已把家眷接来南京居住。事实上，席散之后我便立即搭車到上海去，和伍頌祺接洽之后随即搭船回粵。这是六月上旬的事。留在南京的广东空軍人員获悉我走之后，也陸續秘密离京回粵。

宁粤合作，陈张斗争

一九三一年六月六日我回到广州，那时汪精卫、孙科、古应芬、陈济棠等已开过非常會議，在广州宣布另立国民政府，和南京的国民政府唱对台戏。空軍和海軍也分別成立总司令部，直轄于广州国民政府。亲孙科的张惠长和陈策分別任空軍和海軍总司令。广东空軍原来隶属陈济棠的八路军总指揮部航空处，反蔣前由黃光銳任航空处长。空軍总司令部成立后，广东空軍便脱离陸軍而独立。（总部下成立了两个大队司令部，黃光銳为第一大队司令，胡錦雅为第二大队司令）。这一做法对陈济棠來說，完全是为了装点反蔣的門面

而作出的表面措施。实际上陈一方面积极把原来亲张惠长的黄光锐拉过来，并通过他掌握着原属八路军航空处的空军班底；另一方面又利用我和张惠长之间的矛盾，由他哥哥陈维周和林翼中出面对我特别拉拢，通过我把一部分回粤参加反蒋的空军人员从张惠长手下拉过来。这样，张惠长虽然名义上当了总司令，他实际上能抓到的空军实力也有限。过去八路军航空处之下有三个机队，到了空军总部成立后，扩充为五个机队，我被委为第二队队长。

空军总部成立以后，由于张惠长在政治上有孙科作后台，又有孙系人物陈策控制下的广东海军相呼应，自己又摆老资格，因此，就逐渐和陈济棠发生磨擦。陈济棠为了要对付张惠长，对于曾反对过张的周宝衡和我都积极拉拢，周宝衡还获得了粤海关监督的肥缺。那时陈维周和林翼中经常找我，鼓励我对空军人员多做联络工夫。记得陈维周和林翼中都曾对我透露陈济棠有意要我负责空军，我听了他们的话以后曾找周宝衡商量，并主张最好由周出来负责，自己资历还浅怕担当不来。周说他已当了海关监督，大家分头发展好了，还力劝我不必顾虑，如成事实，他也大力支持。但这事情一度谈过之后就沒有下文了。

陈济棠和张惠长的第一次尖锐冲突是发生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間粵四全大会时期，那时陈济棠鼓动大会代表提案反对宁粤上海和谈关于中委选举问题的协议，和孙科发生意见冲突，结果孙科派一度退出了大会。在这争执过程中，张惠长、陈策等在孙科指使下，一面叫空军、海军代表不附议陈派的提案；另一方面，在孙科派退席后，密令海、空军分别在虎门和唐家湾集中，向陈济棠进行威胁。当我接到张惠长要我全队飞唐家湾的密令时，我立即去第一集团军总部见陈

济棠，陈引我到他的休息室密谈。陈显然事前没有估计到张惠长会出此一着，他听我报告后，在室内踱来踱去，半晌不语。最后他对我说：“张还是总司令，他叫你们去就只管去，但要好好掌握机队。到了唐家湾有什么变化，即来电告知我”。我辞出前，陈济棠给我一本电报密码，还约好以一家十三行的银号为收电地址。我就照陈的指示，表面上执行张的命令，率机队飞唐家湾。以后由于粤四全大会的纠纷解决，空军和海军也分别回到原防。但经过这一回海、空军的联合示威，陈济棠和张惠长、陈策之间（实则是陈济棠与孙科间）的关系就更加恶化下去。

粤四全大会闭幕以后，出现了所谓“宁粤合作”。一九三二年一月，广州的国民政府宣告撤消，西南两机关同时宣布成立。那时孙科已到南京出任行政院长。本来张惠长一向主张扩大空军组织机构，把原隶南京军政部的航空署扩为航空部，梦想自己当上航空部长。早在全国航空会议时期他就在南京散布这一主张，但并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同意。这一次由于孙科上台，张惠长就满怀希望积极活动。有一天，我到陈济棠家坐谈，陈济棠对我说：“张惠长活动成立航空部，想搞空军归中央，我过去花了不少心血培植起广东空军，张惠长如此搞法实在混账。如果蒋介石独裁已被打倒，国家真正统一，归中央倒无所谓，但实际上蒋势力还在，张这样做就等于把空军归蒋介石私人，这怎么行呢？”陈说话时很激怒。我当时极力附和陈的见解，还引用外国为例，说：除法国设有航空部之外，其他英国、美国、意大利都是把空军归陆军或海军指挥的。中国空军只有一百几十架机，并无设立什么航空部的必要。我还投合陈的心理，慫恿陈济棠说：“空军非由总司令自己抓紧不可，绝对不要归中央，一归中

央，广东空軍就必然被蔣介石分化瓦解了”，陈听了我的话十分高兴。以后，我在报上发表了一篇不主张扩大空軍組織机构为航空部的文章，替陈济棠呐喊。

由于广州的国民政府宣告撤消，空軍和海軍两总部是否繼續存在，当时就頗成問題。西南政务委员会成立初期，虽然对这問題沒有討論，但外界都紛紛推測海、空軍机构会有所变动。张惠长和陈策当然不甘心再受陈济棠的統率，因此，就在海、空軍內部散播空气，說海、空軍軍权应归中央，海、空軍两总部的改組問題应候中央解决。那时孙科是行政院长，按照张、陈的想法，当然就是說要由孙科主持的南京中央来解决。他們把“西南”和陈济棠撇在一边。张惠长搞得更露骨，他在一月間就拟好一个空軍誓不参加內战，不再为任何个人工具的通电稿，在空軍內部发动各人签名。那时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一二八抗战的前夕，团结御侮呼声很高，张提出不打內战，当然誰也不能反对，因此大家（包括我在內）都签了名。这个通电在一月十七日发出，全国报纸都加以刊載，措辞是冠冕堂皇，其实张惠长搞这一套把戏，等于公开要求摆脱陈济棠的控制。这一来，张惠长和陈济棠之間的明爭暗斗就发展到了高峰。

受蔣指使，炸飞虜舰

南京孙科政府上台后，为了欺騙群众，应付举国主张抗日救国的要求，曾高唱所謂“对日絕交”論調，但由于蔣介石、汪精卫把孙科政府只作为过渡的，不会让孙稳当院长，因此孙科政府就在“一二八”抗战前夕宣告垮台。孙科辞职后，对淞沪抗战表面上是热烈支持的，还打电报給西南两机关要求出兵支援十九路軍，同时并电张惠长派飞机到沪助

战。为了配合孙科政治上的抗日姿态，张惠长在西南政务委员会上也主张派机参战。陈济棠本身是不愿出兵的，但在輿論压迫下，不得不派出一些空军来表示“西南”的“抗日”。二月初，空军总部在张惠长主持下召开会议，决定派我率领一队驱逐机（约十五架飞机）前往支援十九路军抗战。我于二月十日率粤机队出发，抵达杭州后，曾几次配合南京空军对日机展开空战和轰炸敌军军事目标。不久我接到南京航空署的电令，要我们全队“即飞蚌埠集中，不必入南京”。原来当时南京的汪精卫政府是不愿中日战事扩大的，他们不要粤机队到南京，也涵有怕引起敌人对南京骚扰的意思。我们奉令后即飞蚌埠，留蚌时间约有一个多月。三月间，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在洛阳已开过，原已下野的蒋介石又复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汪公开勾结起来。此时淞沪抗战已近尾声，上海的中日停战谈判正在进行。四月下旬，我在蚌埠队部已听说广东海空军有变动。有一天，忽接黄光锐来电说张惠长已离粤，接近张的人员也大部分离职，希望我能早日回粤协助空军机构改组的工作。我当时即派付队长谢莽飞回广州，向黄光锐表示支持他上台。不久就在报上获知西南政务委员会已于五月初先后议决撤消海、空军两总部，并派黄光锐为广东空军司令官。由于五月五日发表了中日上海停战协定，我们的援沪任务也算结束了。一天早上，蒋介石忽亲自打电话到蚌埠队部找我，要我立即飞京见他。（这是我到蚌埠以后第二次被蒋召见，上一次时间是在四月初，我见蒋主要是向他报告粤空军援沪的战况。）当天我飞抵南京向军委会报到，蒋的侍从秘书说蒋要我下午三时到陵园官邸见他。到时蒋在官邸左边大厅接见我，开头由我向他报告粤机队情况，他“勉慰”了几句以后就对我说：“广东现在发生事变，

陈策煽动海軍反抗政府命令，陈总司令（指陈济棠）有电給我要求調回你队，你队应立刻飞回广州协助他解决那些叛变的海軍。”蔣还強調軍紀必須整飭，絕不容許任何人加以破坏。我表示接受他的命令。告辞时蔣問我是否即返蚌埠，我說还要回安乐飯店取行李。蔣說：“你队明天回广州去好了，今天黄秉衡（航空署署长）会到飯店找你。”果然，不久黄秉衡带了五千元大洋来，說是蔣委員長送給我的。当天我即返蚌埠，第二天率全队飞粵。抵广州时是五月中旬，那时空軍的改組問題已告解决。接近张惠长的人員刘植炎、杨官宇、邓粵銘、胡錦雅都走了，黄光銳已上台当粵空軍司令官。但海軍的一部分舰只和陈庆云的海軍陆战队却以琼州海口为根据地，抗拒改組命令。我回广州不久，海軍中有一刘开坤（好似是海軍学校教育长，我在德国时与他認識）曾秘密找我。他带来一封孙科的亲笔信，內容是劝我把空軍飞走，还說即使不走，也不要和海軍为难，同时还給我一张五万元的支票。我当时不肯接受，事后我把孙科的信拿給陈济棠看，陈因此以后对我更加信任。他提出要空軍协助陈汉光旅渡海接收海口，我主张对駐海口的飞鷹、福安等舰和秀英炮台、海軍行营进行突击性的空袭。七月四日，我奉命率机五架前往执行任务。五日飞鷹舰被炸沉沒，海口市各預定轰炸目标均中弹。經此突袭，海軍方面停止抵抗，陈汉光旅順利渡海完成接收任务。陈济棠为了搞賞我的机队，曾拨出五万元毫洋的奖金。由于半年前我曾列名空軍通电誓不参加內战，这一次却和海軍发生內鬩，还炸沉飞鷹舰，当时海內外輿論对我大有責难，（以后我到美国也受到华侨的質問）。这一事件今天回忆起来，深感遺憾。

“西南”垮台，弃陈投蒋

我在广东空军和黄光锐相处很好。陈济棠对我也很信任。一九三三年春，陈还派我和黄光锐、梅龙安、张子璇等到美国考察航空事业。在我们动身赴美之前，黄秉衡（他早已卸任航空署署长，改任国府参军）忽抵广州。他是空军袍泽，和我也有点交情，在空军人员公讌他的第二天，我约他到我家吃饭。席散之后，别的人都走了，他还不走，一直和我谈到清晨一时。他告诉我：“我们听说你快要到美国去，委座（指蒋介石）有信给你。”我接信一看，内容除一些客气话，“勉励”我要为祖国好好服务之类外，同时还附了一本电报密码给我。黄秉衡跟着对我大谈国内外形势，大意说：

“十九路军在福建搞人民政府已垮台了，目前中央兵力十分雄厚，已开始向两广方面施加压力。国际方面，德、意、日三国轴心已形成，这对我国有利。复兴中国一定要靠德国技术援助，今天德、意两国都派来不少优秀的将领到我国当顾问，协助我国训练军队，你是留学德国的，委座对你期望甚殷。他的意思要你不必到美国去，应该留在广东俟机抓住空军。”经过黄秉衡这样再三劝说，我只推说还要考虑，一时未能作出决定。以后我把黄这一番话告诉黄光锐，黄光锐说：“黄秉衡的话不足信，蒋介石那里有兵力来搞广东？”我把蒋的信和电报密码交黄光锐转陈济棠。黄说：“这事情暂时不要报告陈老总，否则我们去美国不成了。”约两三周后，我和黄光锐等首途赴美，过沪时我曾见到黄秉衡，告诉他我已决定出国一行，目前一时还离不开陈济棠，请他谅解。黄听了没有说什么。我到美国游历了四个月便回粤。

以上是陈济棠垮台前，蒋介石暗中企图分化广东空军的